

◀ (上接6版)

自由具体是指什么，又是因为哪些原因而让人倍加珍视？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有时会得到迥然相异的回答。不仅法国的革命者和美国宪法的缔造者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客们也是如此。像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自由只能在尽可能没有管制和限制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蓬勃发展。相对的，德国政治家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rah Wagenknecht)则在其著作《要自由，不要资本主义》(Freiheit statt Kapitalismus)中论述道，不受束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是相互排斥的。如今，各行各业的公司都会以自由的感觉来做广告，比如通过某种汽车、某个香烟品牌或是某种特殊的卫生巾就可以实现自由。可见，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人们对于自由概念的理解和设想往往千差万别。

哲学家将自由区分为主观(意志)自由和政治自由。一方面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主体究竟是否具备自由的意志，是否有能力自主决定？还是说我们更多地是由我们的自然本质或者在我们大脑中的变化过程所决定的？政治问题则与此不同：一个社会在哪些情况下是自由组织的？此外，我们是将自由理解为一种形式和法律上的性质，还是认为自由也指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这也有所不同。比如一名可怜的贫困女工，她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她是否也拥有自主决定生活的实际自由呢？与之相关的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消极自由是外界约束和他人统治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实现自己意志、在各种选项中自主决定的可能性和自身能力的“自由”。从刚才针对路德及其影响的简要探讨来看，他也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自由的重要一环。

作为催化剂的路德

如果有人最后要问，德国中部维滕贝格的一个本来相当不起眼的僧侣和神学家究竟凭借什么引发了如此影响深远的变化，那么答案自然不会全面的。从个人角度来看，路德是个性格坚强、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物。在辩论时，他能够用机智的话语表明自己的立场主张。这当然也是源于他在神学问题上简直教条式的自信(sola

scriptura)。他顶住所有阻力，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确信无疑并且想要对基督教的依据真正追根溯源，其程度已经接近原教旨主义。他无疑是个依信念行动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念，不确信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一般人大概是不可能像路德这样来行事。历史表明，路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的。但他肯定不是超人，也不是完美无瑕的道德榜样。对待宗教改革家是否应当持有这样的期待，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怀疑。路德的自我批判性有助于避免无谓地将路德理想化；认识到即便再伟大的历史也不过是人创造的，同样可以避免这种理想化的形成。

除了个人因素，外界环境和幸运巧合的重要性绝对不可小觑。与基督教会内部早期的许多宗教改革家不同，路德的观点并没有接受融合，没有成为庞大天主教组织中的一个流派，比如像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z von Assisi, 1181—1226)和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 1260—1328)那样；他也没有被当作异端除掉，比如像扬·胡斯(Jan Hus, 1370—1415)、萨伏那罗拉(Savonarola, 1452—1498)、汉斯·博姆(Hans Böhm, 1458—1476)和其他许多人那样。路德之所以逃脱了失败者的命运，因为他的神学可以与德国诸侯面对教宗和皇帝时主张的政治利益相结合。要反对统治者，没有同盟者就什么都做不到。

欧洲的文化当时正面临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的临界点，处于危机和根本性变革的状态下——我们如今将现代化、民族化、殖民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印刷机等关键词与之联系在一起。宗教改革对于这个世界的长远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无论是所谓的宗教改革成果，还是农民解放的失败，其责任都不能归到路德一个人身上。在这些事件中，路德并非唯一发挥作用的力量，而只是一味催化剂。我们不应对他个人做出过度评价。这类根本性的改变从来都不是由个人造成的，而只是通过个人表现了出来。路德的所作所为影响了转变的发展动态，指明了一个转变的方向。宗教改革是一场根本性全面变革的一部分，这场变革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理想的传播和形成做出了贡献。

(作者Helmut Heit为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5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节录。翻译:Enter Consulting)

从旧知识体系中挣脱的路德与他末期的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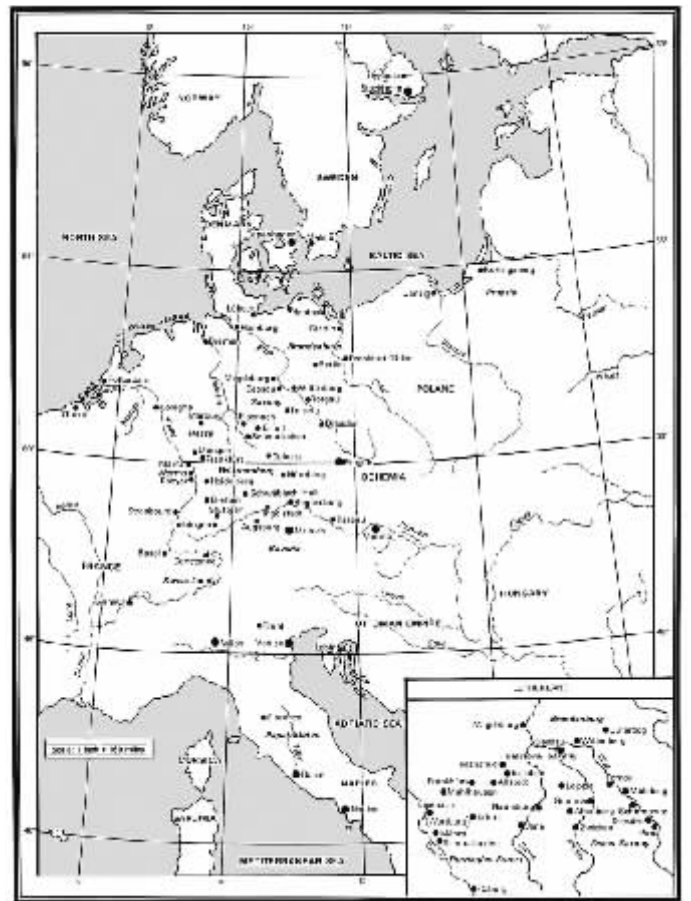
编译/胡梦霞

路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对路德的各式刻画中，他兼具暴躁与温顺、夸夸其谈与害羞腼腆、无所顾忌与笃信虔敬、革命与反动，他老谋深算，却又天真地被自己目的高远的反叛所招致的后果迷惑。

在今天的美国以及西欧一些更为世俗化的地区，人们在阅读一份财产契约或政府预算时，已经不太可能仅凭简要的法理论证，来追溯其所依凭的古老神学论辩和裁决了。但对它们的检视能让我们一窥历史可能的发展样态——如果历史以不一样的方式发生，尤其是500年前由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僧侣发起宗教改革的这段历史。

路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对路德的各式刻画中，他兼具暴躁与温顺、夸夸其谈与害羞腼腆、无所顾忌与笃信虔敬、革命与反动，他老谋深算，却又天真地被自己目的高远的反叛所招致的后果迷惑。在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青年路德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深受自我认同危机折磨的青年僧侣，而这位青年僧侣将欧洲也带入了自我认同危机；在罗兰·H.班顿(Roland H. Bainton)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路德一次次受困于痛苦与挣扎，顿悟的瞬间反而令他更加困惑。路德神学强调灵性的纯粹，而路德的内心生活绝不单纯。

林德尔·罗珀(Lyndal Roper)的最新传记《马丁·路德：叛教者与预言家》将马丁·路德描写为一位极具卡里斯玛、性格暴躁、头脑机敏的德国沙文主义者，他发动了革命，但革命的后续发展却让他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罗珀写道，1521年他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Diet of Worms)为自己辩护后不到一年，路德的追随者中就出现了重大分裂。三年后，农民战争爆发，路德思想中的反威权主义要素推动了这场民众起义，其规模之大，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欧洲都尚无其他农民起义的规模可与之匹敌。罗珀指出，路德起先对暴动的农民和他们的封建领主都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最终转而支持诸侯，宣称叛乱分子是“疯狗”，叛乱是“魔鬼在作祟”。罗珀写道，“这



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中部地图

表明了路德改革的社会保守主义姿态”。

宗教改革孕育了农民起义，而改革的发动者却和封建诸侯站在一起，这一悖论恰恰是新教混乱的政治遗产的缩影。新教可以说为启蒙运动的发生和自由理念的创造创造了诸多先决条件，至少它引导欧洲开始更激进地质疑过去的权威，甚至不少人将西方世俗化进程的开启追溯至此。另一方面，生活的重要部分，即政治和经济，从宗教权威的权限中解放了出来，这可能扩大了某种自由，但这并没有改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

马丁·路德出生于1483年，成长于德国矿镇曼斯菲尔德。路德自称“农民之子”，在曼斯菲尔德泥泞不堪、布满煤尘、充斥着暴力的街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童年的经历让他初识这种以恶毒辱

骂和野蛮论辩为特征的文化，而这也成了他日后诸多著名论辩文章的显著特征，他的文章也因此家喻户晓。

1497年，路德离开曼斯菲尔德，去马格德堡求学。中学毕业后，应父亲要求，他不情愿地进入埃尔福特大学学习法学。学习法学的日子并不长。路德为教会所吸引，1505年，他宣誓成为一名奥思定会的修士。修会学术性的修道团体及其智识传统对路德别具吸引力，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学及其修辞形式深刻影响了日后路德神学的形成。151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但固执己见的神职人员，开始在维滕贝格大学教授神学，在当地的教会布道，并记下其同僚和上级的谬见。

到1517年，尽管动辄与人争辩，路德已成为一个公认的颇有造诣的神甫。众所周知，